

從金鐘到我家：雨傘兩年後再撐

何 式 凝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

摘 要

這是何式凝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針對「雨傘運動」所撰寫的人類學式「參與觀察」論文。本文詳細闡述她作為一個性／性別學者、一個政治素人參與雨傘運動的經驗，以及這段經驗如何促使她反思自己對世界、對生命和對學術的理解。因為參與雨傘運動的經歷，她開始研究參與者經過這場運動之後，在個人、家庭、婚姻和感情生活方面的種種轉變，也必須重新修訂她在雨傘運動之前對「民主情人」這個概念的詮釋。過去她關注的是性別政治 (gender politics)、性的政治 (sexual politics)，現在則不得不看看香港政治，或者是說宏觀的政治 (macro political)，所謂正規的政治 (formal political process) 如何影響我們處理自己的性別、愛情、家庭、婚姻和各種親密關係。她更嘗試用自己的個人經歷來閱讀比較主流的社會運動理論，希望能對資源動員理論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Edwards and McCarthy 2004; Tilly and Tarrow 2007) 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議，並進一步探索宏觀政治與微觀政治的關係。這篇論文結合了文化研究議題、人類學式反思，與個人反身式行動研究，也希望能對於雨傘運動提出一個特殊角度的理解。

關鍵詞：雨傘運動、性別政治、資源動員理論、民主

* * *

壹、引 言

這是我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針對「雨傘運動」所撰寫的人類學式「參與觀察」論文。

我一直在倡議「一條女 (單槍匹馬一女子)、一場運動」(何式凝 2014)，研究一名女性可以怎樣對抗各式各樣在日常生活中的父權表演，但卻從來沒有積極參與什麼政治團體或是反高鐵反國教之類的集體行動。本文詳細闡述我作為一個政治素人參與雨傘運動的經驗，以及它怎樣幫助我、促使我反思自己對世界、對生命和對自己的理解，並且改變了我的學術之路。

作為一個性／性別學者，我可以如何重新定位、繼續我的學術生涯，並重新訂定我的研究方向呢？因為參與雨傘運動的經歷，我開始研究參與者經過這場運動之後在個人、家庭、婚姻和感情生活方面的種種轉變，也必須重新修訂我在雨傘運動之前對「民主情人」這個概念的詮釋。過去我關注的是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性的政治（sexual politics），現在我則不得不看看香港政治，或者是說宏觀的政治（macro political），某一種所謂正規的政治（formal political process），如何影響我們處理自己的性別、愛情、家庭、婚姻和各種親密關係。

最近，我更嘗試用自己的個人經歷來閱讀、比較主流的社會運動理論，這也令我不得不加入相關的討論，希望能對資源動員的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Edwards and McCarthy 2004; Tilly and Tarrow 2007）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議，並進一步探索宏觀政治與微觀政治的關係。

我們需要更深入地探討這些社會運動參與經歷所帶來的影響，包括它是如何影響我們自己和人際關係，特別是我們在親密關係上的種種問題。這方面的討論不單是為了更有效地動員人群參與社會運動，找出更多動員的方法，也是為了使我們可以進一步開發可用的資源，以推動社會運動。這些研究得以讓我們更立體地看到在政治不穩的環境之下，現代家庭的處境，以及這些處境怎樣影響參與者的個人生活（personal life）（Smart 2007），包括個人身分及香港人身分的重建。

這篇論文結合了文化研究議題、人類學式反思，與個人反身式行動研究，也希望能夠對於雨傘運動提出一個特殊角度的理解。

貳、「民主情人」理論修訂之必要

真愛難抑或真普選難？這是 2014 年佔中前夕學生罷課時，我去添馬公園講課的題目。自此，我每次演講都會問現場觀眾，你認為尋找真愛難還是爭取真普選更難（何式凝 2015a）？每一場都有不同的景象。整體來說，年紀稍長的人會明白真愛真的很難得。2016 年前，我也一直認為真愛比真普選更難，我之所以這樣說，可能只是希望突顯出自己是一個在感情上有經歷、明白世情的人；相對的，面對一個大時代，自己對於追尋更理想的社會，卻仍存有一份天真和熱切的期望，覺得爭取真普選和尋求一個民主的社會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而且總有一些人會和自己一同去奮鬥。至於愛情，很多時候個人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來到今天，我並不認為自己在追求真愛方面有什麼太大的改變：我還是鍾情於王菲的「約定」，不會忘記自己希望和他「相約看漫天黃葉遠飛」。不過，因為時勢不好、經濟不景和政治環境的改變，我漸漸明白與男朋友關係之中的局限。原來有種抑鬱，並非愛情可以醫治；自己需要的愛情只是我們追尋好景中的一部份；沒有真普選，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在一國兩制中受到嚴重打擊的城市掙扎求存，我的愛情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我不得不承認在這種社會氛圍下，我的確感覺跟他有一種疏

離，並覺察到我們之間的欠缺：我們對政治的立場不同，他未必能安慰到我，我常常都在一種失戀的狀態。後來他寫了一封情書給我，感覺才好了一些。他說我們不是千辛萬苦來到這裏才失去大家？他重新發表他的愛的宣言，我亦都收貨（接受）。他希望我不要精神分析自己，不要太過沉溺於自己的抑鬱，而我必須嘗試如此去做。

以前我講「民主情人」的重點在超越嫉妒，挑戰「一對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我希望我們與一個人或一個城市的關係，起點都應是一種不帶占有慾的愛，不應只談擁有，導致使用暴力來執行這種擁有權。我提倡一種尊重對方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行動自由的愛情。

我參考 Alain Badiou (2012) 的理論，把愛情視為追求真理的過程，或者說愛就是真理。現在我依然覺得這個說法有道理，但我已經沒有一種可以承載這種說法的狀態了。外人看來，我的烈女形象依然突出，但我有點心虛，因為我知道自己心底多了一點懦弱，覺得自己不夠頂天立地，不知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的愛情、學術和人生。還有，最怕的就是不能救贖自己的關係。我站出來說的話，哪怕對象是我的男朋友或任何人，我也要有更多節制。

這兩年，我幾乎失去了所有我想留存的男伴兒（維持關係的男性友人）。一兩年來，我沒有想到圍繞自己的所有關係，包括與男朋友、好朋友、同事、家人甚至是戰友的，會變得這麼政治化。每一場衝擊，都造成了我和身邊的人的一種分離，以至於讓我看清楚了大家的底蘊。這不單是藍色絲帶與黃色絲帶之爭，在黃絲帶之中也有不同的深淺程度；有些人是黃絲帶之中的「熱血公民」，有些人是黃絲帶中的「本土民主前線」，有些人是「民主思路」。每一個晚上，例如 2016 年年初一的晚上，一個城市的躁動都有可能把我和身邊的人分割開來。接受擲磚頭的和不接受的又分了開來；支持梁天琦的和支持楊岳橋的又分了開來。漸漸我也不敢太快對任何事情下判斷，即使心裡面只有這個判斷，也要隱藏一下，找一個安全的環境，在更恰當的時候才暴露出來。在一些公開場合中，這麼做反而特別舒暢。

在我認識的社運朋友中，他們的私人關係也面臨很多挑戰。黃絲小情侶／小夫妻有他們的爭拗；若男朋友不是香港人，很多事情都不會明白，也會產生爭論。有一些社運女生的男朋友也是社運分子，甚至是來自相同的政治背景，但面對時局的混亂，這些小情侶之間，很多時候也會引起很多衝突。我以前談論真愛和民主時，並沒有特別探討這種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而引起的問題。尊重對方的結社自由並不單指尊重自己的伴侶可以有其他情人，並用自己的方法處理親密關係的自由，也要尊重對方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取向。

還有，很多人認為這些政治立場路線之爭只是屬於男性之間的爭戰。有些男性認為自己的女朋友無需有太多政治意見，無需用權力的框架來分析彼此之間的競爭，最好是乖乖地做一個可愛的女朋友，即使是一個獨當一面的女強人，也應該想辦法使兩個人的關係較為和諧，而不是那麼徹底地去追求一種平等。

我漸漸發覺有更多更大的問題需要我們超越自己的底線去爭取，極端的例子是自焚。以前覺得怎麼會有鄭南榕這樣的人，我在一些影片中看到他的影子，久久不能釋

懷。現在我明白了對某一些人來說，只是取捨有所不同，只不過我以前是完全沒有這種能力、想像和情懷的。

我希望能繼續理解身邊的人的經歷，我透過自己做的研究來理解香港的男人、家庭和女性所經歷的創傷，也製作了一些影片。這些研究本來和香港政治並沒有有什麼重大關係，因為我一直沒有看清楚兩者之間的關聯，我把這些政治因素看為任何研究的背景，而缺乏一種對政治的特別理解。但現在我的研究方向已經由性別政治轉為 Hong Kong Politics and Gender (香港政治與性別)、愛情、家庭的研究，因我更有興趣探索香港政治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人際互動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例如：香港社會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分裂，這種政治紛爭如何影響我們的家庭關係？夫婦或情侶會因為這些紛爭而怎樣改變了對彼此的看法呢？這些關係的轉變又如何改變我們的立場或參與政治的方法？在鼓勵別人參與社會的同時，我們也要清楚明白參與社會運動的後果，並找出治療當中的創傷的方法。

參、戰場的轉移：從金鐘到港大

2014 年 12 月金鐘佔領區清場之後，我們經歷了一輪沉寂（有人稱之為後雨傘抑鬱），抑鬱了一年後，我發起的未來民主大學舉辦了一個雨傘運動的檢討會議，探討如何面對路線之爭……其中一個結論是：運動只是開始，我們要深耕細作。究竟深耕細作是怎樣進行的呢？各人的演繹也有不同。來到 2016 年 9 月，我覺得自己能夠描述的，就是這一兩年來的各種轉變，特別是「戰場」的轉移。然而我卻從未如此抑鬱過。從金鐘佔領區到港大，我曾經用的比喻是：感覺紅衛兵來到我家敲門。如果真的是這樣，我們又該如何撐下去呢？

對一個從未參加過什麼社會運動的學者來說，我能有機會投入一場雨傘運動，實在是一個意義非凡的經歷。佔領運動的 79 天，並不容易，當中的每一天，都有著每一天的掙扎和恐懼。我把這些記在了一本書中，叫《抗命時代的日常》（何式凝 2015b）。

我覺得當時的自己是一個驕傲的香港人，我以抗爭者、佔領者為榮，然而退場不退場，卻把我和很多人分離開來。但當時的我非常肯定的是，總會有「一村人」（村民）留下來，我並不會是孤單的一人。

催淚彈的經驗、橡膠子彈和共產黨的威脅、香港政府的無情與無能，令很多人都非常憤怒，覺得自己要站起來對抗暴力，所以我們組成了「文化界監察暴力行動組」，包括了黃耀明、何韻詩，以及一眾文化人，一起守護同學，他們也是堅決要留守到最後的。雖然佔領運動後來被評定為失敗，因為我們不但沒有爭取到真普選，還帶來社會上從未有過的嚴重分裂，但我們始終相信雨傘運動已經喚起這一代人對民主的追求，即使到最後我們都不能改變殘酷的獨裁統治，也算無愧於時代。

作為一個政治素人，我沒有清楚地看見共產黨的下一步會是大學和香港的法治。

所以我作夢也沒想到，佔領結束後不久，戰場會來到香港大學的法律學院，而在這場對抗李國章的爭戰中，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脆弱，最難解的是內心的歉疚和羞愧。

一、港大覺醒（HKU Vigilance）

2016年7月前，我一直只是一個副教授，連自己工作部門的權力中心邊緣都構不著，所以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在對抗大學權力高層時成為讓人認得出的一份子。直到有一天，因為陳文敏的副校長任命被擱置一事，^①我們四個人（Timothy O’Leary、何錦璇、陳祖為和我）組織了一個靜默的抗議，我們站在一群學者和同學的前面，帶領著兩千人在校園內遊行。^②這時我才驚覺，自己已經踏足另一個戰場，且已換了一個位置。

正當我們以為這兩千人都是在抗爭之際，一小時後，卻又只剩下我們四人；後來，我們乘勢擴張這股對抗的勢力，成立了「港大覺醒」這個組織。組織成立後，我又以為最少會有十二人聯合在一起，誰知一瞬間，這一切又變得毫不實在。面對層出不窮的騷擾（例如：會議機密內容懷疑被偷錄，嚴重違反保密原則及侵犯個人隱私；疑似9月29日校委會會議的錄音流出；亦有人在台灣網路討論區批踢踢發表題為「『爆卦』今日香港，明日台灣？」的文章），實在沒有教授願意天天開會或者在手機討論群組中這麼頻密地溝通和商討對策。其實我們只有一個討論組，在全盛時期也僅有六個人。

這段期間也是校委會民選委員的選舉。我們四個人之中，陳祖為和 Timothy O’Leary 兩位馬上決定參選，並且以高票勝出，於是我又興奮了一陣，因這證明港大起碼有三百多位同事在爭取我們的自由和自主，他們至少願意出來投票。

之後，學生衝擊校委會和圍堵李國章的行動，^③挑戰了很多老師的底線。香港大學

註① 陳文敏教授自2002至2014年出任香港大學法學院院長，「佔領中環」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學院教授戴耀廷曾是其下屬。陳文敏教授此前曾因涉匿名捐款事件引發爭議，然而以港大校長馬斐森為首的中央管理小組（SMT）認為是陳文敏教授無心之失，梁智鴻亦曾表示此事「告一段落」。陳文敏教授也曾被指控給戴耀廷長期放假進行「佔領中環」活動，後證實「雨傘運動」期間，陳教授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任客座教授，且當時已不是法學院院長。《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曾於7月27日撰文披露，港大校委會內李國章、梁智鴻等親建制校委會委託中間人向陳文敏遊說，要求陳文敏在收到校委會任命後馬上請辭。陳文敏隨後證實確實有人多次遊說。

註② 港大校務委員會7月28日下午召開例會，討論以「等待首席副校長」上任為由，押後處理副校長任命；最後決定維持「等理首副」（「等」首副到）決定。約五十名學生晚上衝入會議室內抗議並包圍委員，矛頭直指由行政長官梁振英委任的委員李國章，學生多次高呼「李國章可恥」。校務委員會成員盧寵茂在混亂中跌倒，一度表示不適及暈倒，需要救護車送院。學生佔領會議室不讓委員離開，並要求委員在一分鐘內返回座位，否則以後也阻止開會。校委會主席梁智鴻隨後對學生表示，願意和學生對話。包括李國章在內的多名委員提早離場。李國章批評這如同紅衛兵搞文化大革命一般，先驅逐教授，再強逼他們承認自己做錯：「完全是歷史重演，那是私刑」，而中國媒體則暗示學生活動背後有「港獨」勢力操控。

註③ 香港大學學生於2016年1月18日下午召開記者招待會，宣佈將於20日開始罷課，暫定罷課一星期，抗議梁振英堅持委任李國章為港大校委會主席。罷課委員會成員梁麗幗表示罷課將至少延續到1月26日，校務委員會舉行會議當日。

十位學院院長發表聯合聲明，強調校內及校外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的原則，呼籲「不能縱容任何企圖擾亂大學正常運作的不文明行爲」。

政府刊憲委任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出任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任期三年。學生要罷課，^④老師不贊成；學生希望老師罷教，老師完全沒有這個想法。後來學生罷課，反對李國章任校委會主席，並要求改變特首必然任校監制。在國殤之柱邊舉行的罷課集會，約有三百人參與，不如理想，也沒有老師出席，集會上我只看到傅景華、鍾庭耀在那裡！

於是我感到十分為難，因為我沒有發起罷教，那些在雨傘運動中覺得被我搶奪了光環的「右膠」（政治極右派）^⑤馬上群起攻擊，而我覺得自己「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加入了校委會的同事，決定要找一個方法和李國章合作，他們相信據理力爭，就可以為港大的學術自由和自主爭取真正的保障。他們認為能夠爭取到成立一個獨立委員會檢討港大校委會的權力和運作，實在是一個非常好的結果。

港大校委會新任主席李國章上任後首次會議，大樓外逾三百名港大學生及聲援民眾在寒風中冒雨通宵圍堵，大批警察和保安企圖衝入，多人表示曾有警察亮出胡椒噴霧。混亂中，李國章在警員護送下抄小路乘車離開。

學生因為校委會沒有交代時間表，沒有在校委會結束後馬上釐清當中決策的種種理據，而作出激烈的對抗行動，卻被許多老師批評為「完全沒有必要」，也因此蒙受各種批評，反而給校委會一個踐踏學生的機會。但我和少數人認為，學生的行動有其象徵意義，雖然他們做得不夠漂亮，但也不應承受這麼多的批評和「切割」。尤其我覺得，很多人，特別是老師，都沒有為這件事站出來做過什麼，他們更沒有理由對年輕的學生指指點點。

二、魚蛋事件^⑥

雖然學生們覺得自己已經盡量克制，我和一些老師們仍為了港大學生當晚圍堵李國章的行爲是否粗暴、是否暴民、是否 mob rule 屬於暴民政治幾乎反抬（鬧翻）。許多人只看到鏡頭前最激烈的一刻，就趁機攝位站在高牆的一面，以示本身的中立。在要求和兩個權貴對話時所發生的肢體接觸以及呼叫口號的聲浪，使得校長覺得自己有生

註④ 港大校委會新任主席李國章上任後首次會議，大樓外逾三百名港大學生及聲援民眾通宵忍受寒風冒雨圍堵，要求李在會後於大堂跟同學對話，希望知道成立修改大學條例專責小組的時間表。在同學與校方商討安排的幾小時內，校方的說法是，會安排校長出來見記者，於是所有記者在校方人員安排的大樓一角放置麥克風、準備好攝影機。此時突然有人大喊：「李國章偷溜了！」大批警察和保安企圖衝入停車場，本在停車場出口留守的學生使用大垃圾桶阻止，在混亂中，李國章在警員護送下抄小路乘車離開。

註⑤ 參考網路資料〈何謂右膠？〉（陳景輝 2014）

註⑥ 發生於 2016 年 2 月 8 日農曆年初一晚至上至 2 月 9 日年初二早上，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及香港警察驅趕旺角無牌熟食小販，有本土派組織加入抵抗，結果爆發警民衝突，有警員向天鳴槍示警，示威者亦以投擲路磚等方式還擊。翌日特首梁振英將之定為「暴亂」，有外國媒體以「魚蛋革命」或「魚蛋騷亂」命名這次事件。事件被視為繼 2014 年「雨傘革命」後最大影響力的一次街頭社會運動。

命危險，決定把學生送官究治。而爲了保護權貴，學校濫用救護車服務，動用大批警員衝入學校，再利用警力施行調虎離山計，讓校委會委員得以離開，學生也對此極爲憤怒。

學生搞這些群眾活動，當然不夠老練，但我的同事只顧心痛學生沒有成熟的處理手法，沒有斯斯文文打條港大領帶，在寒流來襲的晚上，擺好陣容等候對話，實在不夠得體，也沒有讓別人看到他們和平抗爭的決心。

那年初二早上一覺醒來，看見旺角「魚蛋事件」，拘捕了數十人，實在慘不忍睹。我即使再不同意他們的策略，其抗爭之路也的確辛酸。我明白只要有身體碰撞，無論如何強調「請大家看看背後制度的暴力，有權有勢的人的暴力」，都是枉然。在我的圈子中，我對學生的理解是沒有位置的，所以份外覺得孤單。可每當我抒發自己這些感受時，卻被認爲是過分偏袒學生的。

佔領運動以來不當的使用警力、七警^⑦和朱經緯事件^⑧的拖延處理、律政不公、港大校委會事件、李國章、何君堯、譚惠珠的任命、「銅鑼灣書店」五人陸續失蹤案、林榮基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陪同下開記者招待會，交代在大陸被拘留的細節……體制暴力與謊言，罄竹難書。梁振英政府對所有不同意見的充耳不聞和一意孤行，已是存在我們心中的真相。但是這些依然很難說服我身邊的人，每一個晚上，每一種城市的躁動都有可能把我和他們分割開來。

肆、被消失的「自我感覺良好」

一、沒有付上和平抗爭的代價

在佔領區清場的日子，我在陰差陽錯之中決定按照原定計劃來到台北舉辦我的新書《何式性望愛》（何式凝 2014）的發布會，卻沒有想到，碰巧遇到金鐘清場的那一天，我因此沒有成爲被捕的三百多人中的一位，所以我也沒有爲我的公民抗命付上什麼代價。當時在我的想像中，這個坐下來被捕或多或少帶著一種英雄式的淒美，想像很多人在電視機前看著你被抬走，然後他們會在警局門外守候，等待你們保釋或拒保出來。至於這個被捕會帶來什麼後果，也不是很清楚。不過在參與佔中的時候，也略略地想過：會不會留案底然後影響自己的工作呢？儘管這麼考慮過，卻一直想著，萬一真的要這樣就這樣吧，但始終覺得這個現實是稍微遙遠。不過，當戰場來到港大之後，一切就變得非常真實。

註⑦ 2014年10月15日，佔領運動進入第19天，警察對示威者濫用私刑，再挑起公眾怒火。公民黨社福界選委會健超，凌晨在添馬公園示威期間，遭7名員警帶到公園暗角圍毆最少4分鐘，身上出現多處遭硬物撞擊的傷痕。當晚800人包圍警察總部，百多名社工爲健超排隊報案。

註⑧ 沙田警區前指揮官朱經緯警司於2014年11月26日深夜，在旺角驅散佔領人士期間，被拍到揮舞警棍打向多名路人，當中包括婦孺。朱經緯警司其後被調離，並於聖誕節前後提早退休。

原來我們要付的代價就是自己的老闆對自己的看法，當同事不喜歡你說話的態度和語氣，並且認為你是一位「把抗爭文化帶入部門」的同事的時候，你可以怎樣為自己辯護？面對嘲諷的嘴臉或他們的冷漠時，你如何抑壓自己內心的失望和不屑？當大學內有權有勢的人可以掌握你的命運時，你又怎麼保護自己？當整個大學的評估制度都在迫令你競爭再競爭、向上再向上的時候，你還可以怎樣？我們還能期望大學的老師會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不惜危害自己的前途嗎？

二、Lady Gaga 的「Til it Happens to You!」

我做了八年副教授後，才升為教授。因為我沒有辦法放棄我自己喜愛的工作，一份得來絕不容易的工作，加上我自己作為一位女性，和其他很多女性一樣，都是較遲才建立起自己的學術地位的，所以我們特別珍惜自己的工作。我必須要申請成為正教授，才可以符合申請延後退休的基本條件。

羞恥和恐懼的文化對女性來說一點都不陌生，正如很多受虐的婦女一樣，她們以為自己的沉默和忍讓，可以讓她們能逃過丈夫的暴力。很多女性都習慣了沉默，希望自己的委屈可以保全大局（Gill 2009）。我要擺脫這種恐懼，談何容易，但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學習。

曾有很多人提醒我，不要高調地談論雨傘運動，特別是在申請升職期間，一定要忍耐。我覺得很難受，但我沒有大聲叫喊，就像很多被上級性騷擾的下屬，當下沒有出聲，從上司的辦公室走出來時也沒有大叫，回到家中才意識到這其實是性騷擾。一個烈女，這麼軟弱，還有什麼面目去見江東父老？在奧斯卡頒獎典禮，見到 Lady Gaga 唱 *Til it Happens to You*，還帶領這麼多曾受傷害的朋友一起站出來，真的非常感動。

一條女參與抗爭所要付出的代價，原來不是關於鬪街（露宿街頭）、原來不是關於被捕、原來不是關於一群人面對警察，自己坐在小摺椅上和他們對峙一天，而是關於失去自己的聲音，失去一份你很喜歡的工作、失去可以升職的機會、失去退休之後申請延長工作的機會，這些原來是關於自己的面子的。

大學承受的政治打壓、港大教授在每天生活中所面對的管理和制約，反而被當作追求卓越品質的保證，令很多人成為這個制度的支持者。因為很多人都覺得這個制度並非不公正，反而是論功行賞，十分公平，大家並不渴望一個另類的制度，也沒有想像過高等教育可以用其他方法來管治。我們習慣了比賽，習慣了競爭，習慣了要把別人比下去，我們最害怕的是沒有達到管理階層對我們的要求而導致失敗。如果我沒有能力可以很巧妙地顛覆這個制度而不是被制度所要弄，我就要變成一個可憐的失敗者和傻瓜！

我在香港大學工作了這麼多年，得到了一個服務二十五年的長期服務獎，港大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而我這一部分的個人生活正受到嚴重的威脅，我感覺到的打壓是由金鐘來到我家。我們要面對的戰場就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三、「高貴優雅的教授，不要再胡鬧了好嗎？^⑨」

在攻擊我的文章之中，我最喜歡這篇〈高貴優雅的教授，不要再胡鬧了好嗎？〉。盧斯達誓言要揭開我的真面目；我曾穿著一件學術袍，在校園內兜個彎，得到「最佳服裝獎」，誰知這個形象在一些人心中，也是不能磨滅，所以才會寫文章來「歌頌」我。現在自己回頭看來，這件事情的確不怎麼光彩，特別是大家都在散隊之後「散了水」（分道揚鑣），真的很失禮，難怪被人拿來當作話柄。

很多朋友認為我不應該理會這些批評，應該繼續優雅，繼續跳芭蕾舞，我當然也希望能夠繼續過這樣的生活，不過，我也要付上良心的代價。

我想在學術世界之中找到一種生存方式，或者能在學術世界與現實社會之間找到一種平衡，「表演」一種顛覆的可能，又或者從制度裏面去挑戰這個制度，因為我的存在至少是一根刺，我就是刺你的眼，令你不舒服。結果呢？搞到自己「兩頭唔到岸」（顧此失彼）。

攻擊我們女教授的人，很清楚地看到我們的弱點。以我多年來在學術圈的訓練，在種種比賽和競爭之中得出來的性格，就是不能認輸，要奮鬥到底，一定不要做制度下的失敗者。制度即使再差，自己仍然得是一個生存者。我要繼續利用我在體制中的位置，發揮我的影響力，所以我要更努力地保存我的市場價值，而這一種生存策略也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明白和認為值得同情的。

我的苦苦掙扎，當然也包括了要證明自己和一般的教授是有分別的：我比他們勇敢一些，我比他們願意多付出一些。可惜，這個「多一些」真的都只不過是「一些」而已，是「些微」到不得了的一些而已。

在我工作的學術界，我們生活在一個每天要學習依附權貴，否則就會被淘汰的環境中。很多時候，我們得到資源的機會，取決於自己能否了解這個機構的運作。有些工作上的成就，在於上頭或再上頭及所有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的評估，因此漸漸地我們學會找尋一個方法來取悅有權力的人（還要包括他們身邊其他友好、有影響力的人）。我們要學會分辨誰是可以「帶挈（關照）我們發達的人」，然後就對他們格外殷勤，希望做到有一天可以攞到彩（得到好康），獲得各種資訊和機會。很少人會知道攀附權貴是甚麼意思，因為這是每天生活生存所必需的伎倆。

因此我時常陷入一種內疚和羞辱的狀態之中，在我對他們的歧視中，同時也帶有太多對自己的責備，和對自己能力不足的慚愧。加上我時常被人這樣抨擊，我也吸收了很多他們對我的判斷。直至我越來越沉默，連寫一篇日記都覺得吃力，當然，我也害怕其中的後果。

我常常希望有些人可以站出來，讓我能覺得有個倚靠，因為找不到同路人，不但

註⑨ 盧斯達筆名無待堂，是香港知名本土派作家，並有於 MyRadio 主持節目。他自稱於 1990 年出生，早年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他的博客文章以激烈見稱，也常被各大報章轉載。參考網路資料〈高貴優雅的教授，不要再胡鬧了好嗎？〉（盧斯達 2016）

越來越覺得孤單，也越來越憤怒。因為這樣的狀態，我跟其他人越來越疏離，我對他們也有一種鄙視，就像打擊我的人鄙視我一樣。

伍、我應該去跳脫衣舞，而不是芭蕾舞！

雨傘之後，《號外》雜誌請我寫一句要跟香港人說的話，我說「Keep calm and carry on dancing」，亦得到很多人的共鳴和支持。至於應該跳什麼舞，應該在什麼舞台上跳呢？我沒有想得很清楚。

好友郭啓華質疑我為什麼要去考皇家芭蕾舞八級試。他知道我很辛苦，上次考試「肥」（被當）了，也應該作罷，為什麼還要堅持，令自己這麼痛苦？明顯因為本身的資質、底子、性格，再加上年齡體力等的限制，使得應付這個考試是非常吃力的事情。他的建議是：我應該去跳脫衣舞，而不是芭蕾舞！我選擇了不適合自己的舞蹈和舞台。就算我要跳，也不用去考試，把自己置於不必要的規則之中。最可笑的是這不單是我在舞蹈生涯的痛苦，其實也是我學術生涯的寫照。我可以勉勉強強應付每一種考試，但我一直都被各種競爭壓得透不過氣，我在邊緣掙扎，做個 scholar artist，拍紀錄片、搞劇場，做到仆街（虛脫），希望能「仆出一條新街」（在挫折中找到新出路），所以我也加倍努力，用學術圈的語言來演出一些必要的項目，也因此我才得以在當今社會生存下來。或者我應該選擇更進一步將自己的經歷政治化、爆料，把所有涉及政治打壓我的同事都拱出來，讓社會大眾看到我們港大教授的現狀；我應該提倡罷課；我應該更強硬地挑戰李國章，而不是背著一個申請升職、申請延長退休的包袱。我並沒有這樣做，就只好對我自己作為一個學者、老師卻不能付出更多而繼續內疚！也有一些人認為我對學術圈的眷戀，其實是一種更具持續性和戰略性的抗爭方式。感謝這些朋友對我這麼寬容。

Victor Turner (1969) 用闕限 (the liminal) 來形容參與社會運動時的一個轉化階段 (the transformative stage of the ritual process)。雨傘運動 79 天的佔領，的確就是 Turner 所說的“Luminal Happening”，沒有比這個更合適的形容詞可以說出我記憶中的佔領。

參與佔領的過程的確有一種閃閃發亮的感覺，彷彿進入了如夢似真的狀態，因為我們從未見過自己的城市和馬路有著這樣的面貌，也從來沒有見過香港人是這樣的團結在一起。我們互相支持，共同希望擺脫體制和社會架構一直以來給我們的束縛，霸佔馬路／翻街（露宿街頭）／與警察對抗的過程中，我們「經歷自由 (freedom)、平等 (egalitarianism)、博愛／團契 (communion) 和創造 (creativity)」，的確是「情感與認知上的解放」(Yang 2000, 398)，讓自己可以重新了解自己、香港人和中港關係。佔領區自行組織社區生活，例如單車發電、自修室、湯水飲食的提供等，都有助解釋 Yang 所列舉的價值如何在佔領中具體實現。

這篇文章所分享的啓示，可以豐富大家對參與佔領運動人士的身份轉變的了解，

讓大家明白那些像我這樣的教授是怎樣和其他佔領者一同經歷這一種情感上的覺醒，我們如何認識和了解自己的各方面，包括身體在催淚彈之下的真實感受，睡在街上，冒雨集會，高呼「梁振英下台」、「警察可恥」和「我要真普選」時的激動，以及我們內心對民主的渴求和美好生活的追尋。這些新的內在經歷，就這樣與外面的世界連結起來，建立起我們心中香港人這個身份認同的一個新面向。

不過，Luminal 這個字帶著濃厚的浪漫色彩，只能夠捕捉到我在當中曾有過的喜悅，卻說不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我感受過的徬徨掙扎和衝擊。我們其實還需要另一些概念來捕捉我們還在經歷的「後雨傘抑鬱」和我們所經歷過的靈魂暴力（何式凝 2015b）。

經過了既有切膚之痛也帶著浪漫色彩的佔領之後，運動參與者的生活究竟是怎樣的呢？McAdam（1989）描述了社會運動帶給其參與者於個人和政治方面的影響（person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其後當我見證陳文敏事件和港大「淪陷」時，我清楚地感受到自己作出的反應和選擇，的確是因為雨傘運動帶給我的種種啓示。

由於在運動中經歷過這些美好，在運動後回到保守的社會時，這兩者的經驗差距會使個人對實際的生活長期感到不滿和憂傷，而這亦是為何 Luminal Stage 的經歷有助於推動下一波的社會運動，因任何社會運動都是立基於對現狀的不滿。

McAdam 的研究發現，一些高危險的社會運動參與，可以影響一生：結社的選擇、政治取向、參與社會運動的路線以及世界觀。他研究那些 1964 年 Mississippi Summer Project 的參加者們二十五年後的生活，包括這些經歷如何影響著他們的婚姻、擇偶條件、工作選擇，以及他們的政治取向促使他們與哪些團體連結。有些人經歷了一個“conversion”（宗教式的洗禮）過程，就像是重生了，變成一個新造的人；有些人即使不能完全改變，但也清晰地看到他們的“alteration”（自我修正）和各種可見的轉變。

從後來看，香港人的雨傘運動不算是具高危險性的社會運動，但從過程中看，在 928 當晚以至後來留守期間，都曾盛傳政府會開槍鎮壓，對當時走出前線的人來說，在他們的主觀意識裡，很難說這並不是一場高危險抗爭。政府多次發放催淚彈和用暴力手段鎮壓，大家也都清楚將有受傷和被捕的可能；即使不算是高危險，衆人也知道自己極有可能必須面對警察的暴力以及要付上的法律代價。另一方面，不同佔領場域的危險度不同，因此對當中參與者的影響可能也不同。後來可見的是，從旺角佔領區走出來的政治人物與金鐘區的路線完全不同，原因不一定是由於佔領區的經歷不同，但我相信這對他們是有影響的。

對很多積極參與社運的人士來說，這次的投入也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對像我這樣的政治素人來說，歷時 79 日的佔領，是一段頗長的時間，的確留下不可磨滅的記憶。我和文化監暴的朋友在金鐘駐紮到後來經常去了旺角，看見不同類型的與警察的抗衡和運動之間的派系鬥爭，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都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而我亦感覺到這些經歷和記憶在過去兩年來一直影響著我的情緒和生活上的各種抉擇，改變了我對自己作為一個學者，一條女（一名女性）、一個香港市民，對自己和政府的期望。這

亦特別加強了我在工作崗位上，覺得自己不能對所見到的不公平視若無睹，因而也惹來不少麻煩。

陸、雨傘兩年後再撐

一、日記作為救贖

2015 年 3 月，我為《抗命時代的日常》寫了一篇序，談到「日記作為一種救贖」、「以書寫成就自己」、「日記作為抗爭，與同伴譜寫未來」。來到今天，我要怎樣撐下去呢？一方面希望可以更加明白，面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我還有沒有更好的方式去解說自己的選擇？我期許自己至少能繼續寫日記，因為最痛苦的就是說不出自己的痛苦，失去了自我表達的能力。其實，除了表達自己的想法、誠實地面對自己之外，我們還有什麼？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中，我明白當務之急就是令這個靈魂不死。這不只體現在一個人肉體上的健康或精神上的完整。

我比先前任何一個時候更覺得要找個公共位置，跟時代有一個對話，我相信只有透過表達自己的想法，彰顯個人的獨特性，才能有群體的面向，因為個人性和群體性是互為表裡的。這點我還未做得很好，但我知這是作為一條女要走的方向，這些沒有什麼大道理的女性寫作，也是我一定要捍衛和持續的。

村上春樹說的「雞蛋」就是我們每一個受高牆壓制的普通人，「我們都是獨一無二，裝在脆弱外殼中的靈魂」。「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獨特而活生生的靈魂，體制卻沒有。我們不能允許體制剝削我們，我們不能允許體制自行其是。」

無論結果是什麼，我依然希望能夠在臉書繼續書寫我的「港大教授血淚史」，在平常沒有特別的抗爭事件的時候，這個欄目的確能夠讓我覺得自己有一種空間和自由去表達自己的感受。可是真正有事發生影響港大的時候，很多事情卻不能寫出來，於是紀錄變得斷斷續續，但這也就是我們在抗爭路上情緒起伏的寫照，是我們生活中時常面對各種起伏時的寫照。無論如何，即使是斷斷續續的，也是延續的一種方式。

二、反抗政治打壓：文化監暴與文化人團結在一起

2016 年 2 月 12 日早上，我單槍匹馬一人前往九龍城法院，聲援魚蛋事件中被定性為暴民的學民成員林淳軒。我只知道自己為了某些原因想去，或許我想試著做點事情令自己好過一點，因此雖然找不到朋友相伴，還是決定前去。這一生第一次這樣坐在法庭內，雖然在等候的過程中，不斷受到一群出言惡毒的大媽大叔騷擾，但坐在庭內時，由等待直到開庭，我卻能感受到一股團結的力量，是學民思潮表現出來的堅定團結，是很多人因為擔心林淳軒、支持學民，而願意站起來反抗強權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堅定。在這段日子感受到的種種壓抑後，原來我是需要感受這種團結的力量來醫治自己的，希望能夠從跟文化監暴一起的過程中感受到一份支持；我希望自己能有力量

在法院支持同伴，可以化抑鬱為力量。我只好繼續參與各種社會運動的集會，支持人民力量社民連的立法會候選人，我也去灣仔警察總門前參與支持珠海的集會，希望在路上遇到更多同路人。

三、少女的心：與其他「受虐」婦女在一起

因緣際會下葉寶琳邀請我參加了「少女的心」群組，我一直覺得，「少女的心」這個手機聊天群組名，會不會有些太「娘」？經歷了這麼多，漸漸地我越來越喜歡這個名稱，更沒有想到原來這也是我們共同的問題，就是太過少女！

我一向很重視別人怎樣看我，但慢慢學會，有些事情不需再理會。譬如，基督徒不喜歡我發表對性別、婚姻家庭、宗教的言論，現在我已經不覺得如何，我就是說你不喜歡聽的話，吹咩（你奈我何）！但有些事情，我從沒有想過會讓我成為別人的眼中釘，我從參與未來民主大學、和平佔中、雨傘運動到港大覺醒，都很單純地以為自己在做身為香港市民應該做的事情，而我又只能夠以自己的方法來參與。

我以為自己是個好人，誰知在別人眼中卻成了一個表面優雅內裡腐化、出來搶光環的一女子。而實際上，我也覺得他們對我的形容雖然過分刻薄，但嚴格來說，也沒有什麼不對。我自己認識的高級知識分子，在我眼中也大致是如此，我又比他們好多少呢？因此，我就失去了「自我感覺良好」的能力。

我一向以自己能在香港大學任教為榮，二十多年來，我都覺得自己很幸運能在這樣一個自由開放的大學工作。以前大學也發生過干預學術自由的事情，當年鍾庭耀事件，有很多人站出來，積極發言，還成立了獨立委員會徹查誰說了什麼，誰沒有尊重學術自由，大家還可以在電視公開聆訊，之後又有報告總結事情的始末，最後打了勝仗。現在很多駭人聽聞的言論，都是從最高領導人的口中說出來的，卻沒有人覺得需要找他算帳，他就是沙皇，問你怕了沒？對抗的人越來越少。

肯定是怪獸變大了，但怎會大成這樣？而我也因為成了一個運動中人，敏感度加強了。突然看到怪獸的種種面貌，卻依然以一個少女的心來感應這樣的轉變，自然是魂飛魄散。

當然可以說這是又一個例證：政治打壓真的會帶來心靈創傷，以及同路人之間的敵意和互相傷害。看！對方的手段真的夠毒，還能發揮比他們想像中更有效力的成果。這又一次證明對方的道德缺失是真正具有摧毀力的，所以我們一定要站出來譴責他們，以正視聽。

但也可以說，我和很多政治素人，確實經歷了一個當頭棒喝，讓我們進入一個痛苦的自我反省過程。有些人，不能自拔，因為看到自己真的生活在一個腐敗的制度中，身不由己地做了很多自己不認同的事情，著實不好意思出來說些什麼大道理。我們永遠「感激」我們的敵人，虧欠他們。沒有他們成為我們的對手，我們就不知道自己其實是什麼樣的人。敵人令我們進步，可能這種對立，才讓我們了解這個時代之中的自己多一點。

四、何處才是我的主場？

三十年來，我在高等教育界的所見所聞，以及近年參與社會運動的經歷中，讓我見到不少依附權貴的香港人，令人不勝唏噓，才會在本文發出這樣的強烈感嘆。如果說學術界是依附權貴的溫床，或者說學術界大多數人都不明是非，這當然並不是一個準確或得體的描述。一來我的經歷只是限於香港大學，二來社會人士也見到香港大學的確有民主運動人士，也有關心校政民主的同事，只不過為數很少。參與雨傘運動、立法會選舉以及行政長官選委會的港大同事，加起來實在不多，而能夠站出來，讓大家可以於公眾媒體聽到他們的聲音的名字，更只有幾位。我相信很多學者和香港民眾其實都很渴望有更多民主、更多公義，可是，礙於各種政治和個人因素，大部分時間，只能保持沉默。

無疑，中港兩地政權對反對派的打壓日趨積極，言論、集會和學術自由也屢受挑戰。雖然現況離獨裁尚遠，一則是兩地政經脈絡的交錯，令香港體制自然滋生內部衝突和無意的制約；鎮壓、大規模拘捕和一言堂等，依然不是選項。政府依然要透過平行組織、塑造民意、滲透大學社區及借助法院的權威等手段，來消耗抗爭風潮。因此，我不能說香港已處於獨裁統治，但梁振英領導下的政府的確是越來越獨裁，這一點也幾乎是民間和公共論述中的共識。學者清楚地感受到香港和大學的管治的轉變，心底也難免有更多恐懼，只希望能保護自己得來不易的幸福，所以都會盡量配合大學和上司的旨意，盡量避免被人界定為滋事分子，以免前途受損。

我要做社運學者？還是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港大中大理大城大？香港的大學，還有沒有我可以容身的位置？到後來，我也為了自己曾站出來說當權人士不喜歡聽的話而付上了我認為頗為沉重的代價。我以為自己有一點心理準備，但當屈辱來到面前時，還是覺得十分難受。

我一直很希望能在學術圈之外參與一個團體，投身於更多社會事務，特別是民主教育的工作。我曾嘗試發起不同類型的組織，包括未來民主大學、文化監暴和港大覺醒，希望建立自己心目中認為激進的團體。未來民主大學，怎會無疾而終？文化監暴，又是否還是我面對社會各種政治打壓時的一個基地？還是應該去選立法會議員？或是我應該跳出這些組織，回到「一條女一場運動」的狀態呢？

作為一個學者，永遠有一個既定的社會地位和公共形象，是別人所能夠明白的。我們得到了一種基於這個既有定位下形成的認可。但現在越來越覺得，似乎要脫離了這個學術世界，才可以真正做一個比較頂天立地且全新的人。認識我多年的朋友常說我內心其實只是一個少女，這話有點取笑我的成分，但也是我比較容易接受的一個自圓其說的講法。我的抑鬱、我的憤怒和我對這個世界的不滿，只是因為自己還是一個少女。

少女確實很「娘」，淑女更娘，我也越來越害怕這個有天可能變得完全不像自己的「窈窕淑女」。其實，我最希望的是，她即使不能成為超人，至少也不會介意別人看見

她模仿超人，把底褲穿在外面。我很喜歡超人這套制服，完全不合邏輯，卻能創造出一種風格。

這些掙扎，也不是愛情能夠醫治的。不是因為有真愛，就可以不受妒忌折磨，肯為真愛付出、輕看名分，就能夠練就一種內功，發揮一種力量，追尋真普選。因為面對著黑暗的時代，一個人愛情的志業，兩個人親密關係的共業，只是改變社會的微小力量。當然這個力量也是很重要的。現在我漸漸明白，一個群體、一個社會的共業，當中需要的團結、對人性軟弱和黑暗面的挑戰，其實是遠遠超過自身的愛情力量所能夠負荷的。我要繼續守住我的愛情，我要保持著自己快樂的能力，也堅持我對這個城市的愛，我還能做什麼？希望上天給我更多啟示。學術袍還是超人的底褲？體制內還是體制外？

柒、資源動員理論的再思

「資源動員理論」通常著重於如何從外界獲得實質的物資來推動社會運動，但近年來逐漸偏向於找出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Edwards and Gillham 2013），以及個人或群體在其中可以怎樣改變種種不公平現象。因此，資源動員理論的重點發生了改變。我們通常研究那些個體通過何種途徑獲得資源，以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所遇到的障礙，卻很少直接探討參與社會運動對個人、家庭和社會文化的影響。

我以雨傘運動的參與為起點，將自己的個人生命、學術生涯和香港的社會政治脈絡結合起來進行反省，過程中我看見這些理論在理解社會運動對個人情感、志業和身分的轉化過程，以及解構政治藩籬和私密層面的關係上，尤其不足。特別是像我這樣，覺得自己在最初幾乎是一個人起身加入的，其後有很多自發性的行動，也不是受「大台^⑩」的呼召或者指示，甚至有一些其實是因為不滿大台而自發的抗爭。

整場雨傘運動有幾處高潮，而這些高潮都是因為行動者自主行動而引發衝突；這些自主行動明顯多於響應大台號召的行動。例如：毫無社運經驗的學生在 926 走在最前面擋警察；旺角黑漢出來保護示威者；龍和道最前面的女生……這些人大都是基於某種情懷和感觸，而這不是一個傳統的「被動員者」的經歷，因此，這些參加者的心理也很值得研究。

新近的文化理論固然豐富了我們對社會運動的想像。例如文化機會結構（cultural opportunity structure）（Goodwin 1997; Hollands and Vail 2012; Williams 2004）、情感、意識形態的作用等等，都有助我們認識到，動員過程涉及的因素不能單以物質條件作為最重要的指標。文化因素會影響動員模式甚至動員的可能性。但這些理論視野多以第三者的角度出發，很少從一個個體參與的視點去檢視個人在運動中遇到的各種文化

註⑩ 指無線電視台。在香港電視台之中，以無線電視為龍頭，因此被稱為「大台」。在「雨傘革命」中，沒有單一或數個主辦團體領軍，唯現場仍設有主要演講台，由於台上長期有人發表講話，故稱為大台。其控制場面、自詡領導的角色備受爭議，使此詞衍伸出戲謔意味，暗諷「一台獨大」。

阻力以及掙扎等等，例如運動議題的包容性、「以大局為重」思維對個體的運動自主性的壓抑，諸如此類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宏大理論一般無法仔細詳述這些經歷如何影響個體對政治參與的理解，以及對政治本身的理解。

Yang (2000) 的 Liminality 和 Debra King (2006; 2016a; 2016b) 的 Epistemic Break (認知斷層) 都能夠幫助我們了解，佔領運動如何帶來新的經驗，讓我們脫離日常生活的羈絆，以更開放的情懷和新的角度去了解這個世界，達到平等與互相關懷和支持的新境界。這些理論對我們解釋社會運動帶來個人的轉變，十分有用。

資源動員的理論一直是從組織和組織者的角度出發，探討如何動員到更多人和社群來參與社會行動。參與行動的個人似乎只是等待這些組織來動員的對象，角色顯得有點被動。我從自身作為一個政治素人／一名女性參與雨傘運動的經歷出發，察覺這些理論似乎忽略了個人的主體性、經歷和應對的策略。

在這種理論視野下，性別問題多少是被忽略的。在這種政治理論中立的語言體系下，很多時候，參與運動的個人都變成面目模糊的個體，這些理論沒有特別觀察和研究女性參與社會運動的經歷和阻礙。組織者通常把男女可能有的不同經歷和受影響因素混為一談，對一個性別學者來說，這些理論顯然非常不足。假若我們接受 Butler 的說法，對主體的論述，是最政治的一環，那麼資源動員理論嘗試用一種科學的中性語言去概述千差萬別的參與者，也因此很有可能在理論語言中隱沒了一些非常具體的爭鬥和權力關係。

有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社會運動參與者的情緒、感情糾葛、對性的態度會對資源動用產生影響。菲律賓的社會運動中有一個很清晰的「男性情慾機會結構」(libidin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Goodwin 1997)，一直阻礙著女性參政，這些都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作為一名女性，我當然不願意見到很多女性因為這些傳統性別意識和性別歧視而裹足不前，覺得自己不能在社會運動中發揮作用。然而資源動員理論似乎只關心如何動員的問題；他們迫切地想了解大家如何克服障礙，將運動參與者變為更有用的資源，或是如何更好地掌握某些方法，鼓勵他人加入社會運動。

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研究參與社會運動的後果，這其中就包括政治暴力帶來的創傷。這樣可以讓我們看清在政治動盪的環境下現代家庭的處境，以及在這樣的處境中，對參與者人格建立、身分重建、人生抉擇的影響。

這些個人的經歷、個人的創傷，並不能簡單地被歸結為個人的問題，它們也是婚姻的問題、家庭的問題。當社會經歷著一種政治創傷時，我們也在共同建構一種文化的危機，當中包括整個社會面對強權時的恐懼、失望和憤怒。所以，在未決定如何作出進一步的動員之前，我們先要了解這些個體和整體文化的焦慮 (Piotr 2000)。無論我們是否能成為社會運動的資源，或是要不要成為這樣一種資源，我們都要面對我們自己的文化，了解我們自身的問題。

我們對香港前途的想像，無論是民主自決、香港獨立，抑或是「為五斗米折腰」、對中國真誠的認同，都取決於我們經過佔領洗禮之後，如何創造個人人格和集體性

格。如果我們不去追尋真愛／真理，我們的政治不能用來體現一種民主的道德，這一切的抗爭又有何意義呢？

性別研究學者當然很關心權力的問題，例如組織者與已被組織者之間，一直存在一種權力不均，因而也經常會有緊繃的狀態。這些組織以及社會運動的領導階層，大部分是男性，他們動員時採用的角度和分析框架、對大局的看法，都隱含某一種既有的價值判斷和政治議程在內。被動員的個體，很多時候都沒有足夠的資源和能力去批判這些論述的框架，也未必有足夠的時間和訓練去分辨出這個框架的缺陷，所以很容易會跟隨組織者的指揮，但也会有很多特別抗拒這些組織，因而產生其他自發性的抗爭行動。

可是，資源動員理論很少分析組織者與被組織的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和不平等可能造成的種種問題，包括是對形勢和個人能力的錯誤判斷。這些組織和領袖擁有的資訊和權力，令他們振振有詞，而被動員的個體，往往處於弱勢而不自覺。即使有某一種醒覺，或者是隱隱然覺得有問題，也只能隨波逐流，因為市面上可能就只有「和平佔中」這一個抗爭的策略可供選擇。在緊急的情況下，所有的動員反而成為鼓勵其他人走出這個框架，自發建立自己的小團體，與大台對著幹。

同樣的問題亦存在於社會運動理論中較新的框飾理論（framing process theory）（Benford 1993; Benford and Snow 2000），其著眼點仍在於社運的組織者如何透過論述外在環境來突顯社會問題，從而爭取更多參與者。縱使這套理論將重點從外部的物質資源條件轉移到認知過程中，但當中的層級性仍是顯然而見的。

新近的文化理論提出情感因素、文化因素怎樣影響個體或一些群組的取向，例如每一個個體在自己的生活中承受過的不公平，會產生哪樣的心理結構，令他們想採取一些抗議的行動？不過這些理論也無法處理個人在這種心理狀況之下，即使是帶著強烈的抗爭慾望和情懷，如何可以建立起一個平台，或者找到一個平台讓他發聲，處理自己的情緒，又或者把憤怒的情緒轉化成為力量，去改變他不想見到的不公平和不公義。

同樣地，這些理論也沒有解決個人與組織之間的距離，當中性別的因素和各種隱性權力因素也必定要被處理，才能明白當中的權力不平衡如何影響個人的決策和被動員。

我希望透過自己的身心經歷，思考如何顛覆生活和制度中的種種框架。希望我的經歷有助於使我們了解到，在分析個人反思和公共參與之間的關係時，一定要更深入探討組織者與被組織者的關係，並且從不同背景、帶著不同情懷，用參與者的角度來理解社會運動的形成與運作。

捌、總結：「要真愛和真普選都咁（超）難」

愛情與政治、友誼與政治，都是永恆的題目。在我有生之年，這些都是我必須以

我的生命和學術生涯繼續經歷探討的。2016 年前，我一直認為真愛比真普選更難，為什麼現在又覺得真普選更難呢？真愛只在於「在這一刻跟你終於可擁抱」（蘇芮〈憑著愛〉），天國馬上降臨人間，只是一個人一念之間的事。而真普選，是我們整體香港人的事，要七百萬人民自主決，真是難難難。

在後雨傘時代，我們恐怕已經回不去「民主派 vs. 建制派」的簡單時光了。民主陣營之間的矛盾有時候比建制派的尤甚，內部滿佈形形色色的招牌和名號（例如仇外本土、自決、左、右、港獨、永續基本法、暴力和非暴力）。^①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不斷轉移和轉變的戰場，唯有承認：真普選比真愛更難！

* * *

（收件：105 年 9 月 19 日，接受：106 年 1 月 17 日）

註① 參考網路資料〈在絕對敵意和超越左右之外的民主政治〉（陳景輝 2016）

From Admiralty to My Home: Two Years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Sik-Ying H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Professor HO Sik Ying begins with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ticipation in the Umbrella Movement and her academic and personal life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 She shows the extent to which participation in the Movement had the capacity to change her personal life, academic career and perception of democratic struggle as a gender/sexuality scholar. She is now interested in both the politics of the personal and the personal consequences of the political especially as manifested in political processes. Her analysis of the overlap between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has created a space for the exploration of how work life, collegial relationships 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personal life can become sites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When Ho first introduced the idea of a ‘democratic lover’ in her work as a scholar of sexuality it referred to someone who prefers open to exclusive relationships and is not possessive. Thus they apply democratic principles to their relationships. Involvement with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s added a new element to this concept, focusing on how practices of democracy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must include dealing with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tances and the conflicts involved. Her re-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democratic lover’ and reflexive accounts of self-transform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ous kinds of political actions vis-a-vis the Movement illuminate the limitations of resource mobilisation theories in addressing gender and power issues involved in wome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article offers a unique perspectiv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Keywords: Umbrella Movement, Gender Politics,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Democracy

參考文獻

- 何式凝，2014，《何式性望愛》，台北：八旗文化。Ho, P. S. Y.. 2014. *Heshi xing wang ai*. [I am Ho Sik Ying, Age 55]. Taipei: Gusa Publishing.
- 何式凝，2015a，〈愛慾與民主：尋真愛難，還是爭真普選難？〉，葉蔭聰、陳景輝主編，《罷課不霸學：雨傘運動前夕的理論和思想大檢閱》，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 Ho, P. S. Y. 2015. “Shei keyi dakai guojie de men? Yimin zhengce de jieji zhuyi” [True Love and True Democracy: Which Is More Difficult?]. In “*Bake bubaxue : Yusan yundong qianxi de lilun he sixiang dajianyu*” [Boycott Classes, Continue Learning: A Pre-Umbrella Movement Review of Theories and Thoughts], eds. Y. C. Yip and K. F. Chan. Hong Kong: Step Forward Multi Media.
- 何式凝，2015b，《抗命時代的日常》，香港：紅出版。Ho, P. S. Y. 2015. *Kangming shidai de richang*. [The Everyday Life in the Era of Resistance]. Hong Kong: Red-publish.
- 陳景輝，2014，〈何謂右膠？〉，<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838>，查閱時間：2016/9/15。
- Chen, Jing-hui. 2016. “Hewei youjiao?” [What is right plastics?].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16).
- 陳景輝，2016，〈在絕對敵意和超越左右之外的民主政治〉，http://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0917/s00012/1474048482633#sthash.IVOvH6y3.dpuf，查閱時間：2016/9/15。
- Chen, Jing-hui. 2016. “Zai juegui diyi he chaoyue zuoyou zhiwai de minzhu zhengzhi” [Democracy beyond the politics of friend/enemy, left/right dichotomy].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16).
- 陳景輝、何式凝、小小、Anthony，2015，《雨傘政治四重奏》，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 Chan, K. F., P. S. Y. Ho, W. S. Poon and K. W. A. Wong. 2015. *Yusan zhengzhi sizhongzou*. [The Umbrella Politics Quartet]. Hong Kong: Step Forward Multi Media.
- 盧斯達，2016，〈高貴優雅的教授，不要再胡鬧了好嗎？〉，<http://dadazim.com/journal/2015/12/go-to-die-ho/>，查閱時間：2016/9/15。
- Lu, Si-da. 2016. “Gaogui youya de jiaoshou , buyao zai hunao le haoma?” [Graceful elegant professor, will you stop fooling around?]. (Accessed on September 15, 2016).
- Badiou, A. and Nicolas Truong. 2012. *In Praise of Love*. London, UK: Serpent’s Tail
- Benford, R. D. 1993.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al Forces* 71 (3): 677-701.
- Benford, R. D. and Davi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Edwards, B. and J.D. McCarthy 2004. “Resources and social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s. D.A. Snow, S.A. Soule and H. Kriesi. Malden, MA: Blackwell
- Edwards, B. and P. F. Gillham. 201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In *The Wiley-Blackwell*

-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Movements*, eds. David A. Snow, Donatella Della Porta, Bert Klandermans and Doug McAdam. Oxford, UK: Blackwell.
- Gill, R.. 2009. "Breaking the silence: The hidden injuries of neo-liberal academia." In *Secrecy and Silence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Feminist Reflections*, eds. R. Flood and R. Gill. London, UK: Routledge
- Goodwin, J. 1997. "The libidinal constitution of a high-risk social movement: Affectual ties and solidarity in the Huk Rebellion, 1946 to 195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1): 53-69.
- Hollands, R., and J. Vail. 2012. "The art of social movement: Cultural opportunity, mobilisation, and framing in the early formation of the Amber Collective." *Poetics* 40 (1): 22-43.
- King, D. S. 2006. "Activists and emotional reflexivity: Toward Touraine's subject as social movement." *Sociology* 40 (5): 873-891.
- King, D. S. 2016a. "Critical reflexivity in social activism." Seminar paper, presented at Friendship, Solidarity and New Understandings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York,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King, D. S. 2016b. "Becoming an Activist: Moral Shocks and Epistemic Breaks." Paper presented at Australi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Conference,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 McAdam, D. 1989. "The bi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5): 744-760.
- Piotr, Sztompka. 2000. "Cultural Trauma: The Other Face of Social Chang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3: 449-466.
- Smart, C. 2007. *Personal life: new directions in sociological thinking*.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Tilly, C. and S. Tarrow. 2007.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Colo.: Paradigm Publishers.
- Turner, V.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IL: Aldine Publishing Co.
- Williams, R. H. 2004. "The cultural contexts of collective action: Constraints, opportunities, and the symbolic life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s. D. A. Snow, S. A. Soule and H. Kriesi. Oxford, UK: Blackwell.
- Yang, G. 2000. "The liminal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Red Gua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Sociological Forum* 15 (3): 379-406.

